

大学教育的

真问题

Forum

n

Education

n

he

future



我的高中（选章）

在特区教书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遭遇知识分子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粗鲁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生命化的教育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你拥有哪几种美德

■ 托马斯·利科纳（美国）

什么美德对于坚强的品格来说最为重要？

古希腊人列出了四种。他们认为，智慧是最重要的美德，这种美德引导其他的美德。智慧带来良好的判断能力。它能使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其他人都是有利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将其他的美德付诸实践——什么时候行动，怎样行动，当不同的美德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平衡（举个例子来说，当诚实地说出真相将有损于某个人的感情时，不同的美德就发生了冲突）。智慧能使我们正确地辨别事物，明白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给出优先次序。

希腊人把第二种美德命名为公正。公正意味着尊重所有人的权利。黄金规则是公正的一条准则，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宗教里找到，它引导我们对待别人就像希望别人对待我们那样。既然我们是人，所以公正同样要求我们尊重自己，也就是正确地关注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在学校的品格教育课上，人们总是把精力集中在公正上，因为它包含许多人与人相处的美德——礼貌、诚实、尊敬、责任心、宽容。

第三种美德是坚忍不拔，这种美德常常被人忽略。坚忍不拔能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做我们应该做的。在生活中，正确的决定往往是很难做出的。有一句格言说：“当你坚持不懈时，困难将离你而去。”正如教育学家詹姆斯·斯滕森（James Stenson）观察到的，坚忍不拔是一种内在的刚毅，它能使我们克服或忍受艰苦、挫败、困难和痛楚。勇气、开朗、耐心、毅力、忍耐和健康的自信代表了坚忍不拔的各个方面。

希腊人将自我控制作为第四种美德（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节欲）。自我控制就是克制自我的能力。它能使我们控制自己的脾气，节制自身的肉欲和激情，并去追求平静的、合法的、适度的快乐。它是抵制诱惑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去等

待,并在达到更高、更远的目标时延迟获得的满足感。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道出了自制对于有道德的人生是多么重要:“要么是我们控制自己的欲望,要么是欲望控制我们。”在缺乏自我控制的时候,不顾后果和犯罪的行为总是大量发生。

希腊人的观点涵盖了许多道德领域,但绝不是所有的道德领域。第五种重要的美德就是爱。爱远远超越了公正;爱在给予而公正却在要求。爱是为另一个人做出牺牲的良好意愿。一大堆重要的人类美德——怜悯、同情、善良、慷慨、服务、忠诚、爱国(爱一个国家的高尚事物)以及宽恕——这一切构成了爱的美德。华盛顿·贾维斯(F.Washington Jarvis)在他的《爱和祈祷者》一书里这样写道:“爱——不希图回报的无私的爱——是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力量。它对于爱者和被爱者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爱是一种要求很高的美德。

积极的人生态度是第六种美德。如果你对人生持有消极的态度,那么你会成为自己和别人的负担。如果你态度积极,那么你对你自己和别人来说都会充满意义。性格上的优点:满怀希望、热情、灵活和幽默感,构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方方面面。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年轻还是苍老,都需要切记人生态度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经说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程度和他们自己愿意的差不多。”

看似过时的勤奋工作是第七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在人的一生当中,工作没有替代品。伟大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曾说过:“你能否在世界上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或她)没有经过太多的努力就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我想你不能。”勤奋工作包含了进取心、勤勉、设定目标和随机应变。

第八种重要的美德是正直。正直坚守了道德的基本原则,忠于我们的良知,信守诺言,并维护我们的信仰。拥有正直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是前后一致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正直不同于诚实,诚实是告诉别人真相,而正直是告诉自己真相。作家乔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认为:“最危险的欺骗形式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能使我们做我们所希望的、甚至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并找借口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理。

感激是第九种不可或缺的美德。作家安妮·赫斯特德·伯利(Anne Husted Burleigh)认为:“感激就像爱一样,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意愿产生的行为。

我们选择去感激，就像我们选择去爱一样。”感激常常被描述为幸福生活的秘方。它提醒我们：我们所喝的水都不是从自己挖掘的井里取得的。感激之情要求我们关注日常的祈祷。战斗英雄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曾由于迷失方向乘坐一条救生筏在太平洋上飘泊了21天，当被问及在那段时间里吸取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时，他回答说：“那就是如果当你想喝水的时候就有纯净的淡水，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就有食物放在你面前，那么你就绝不应该再抱怨什么。”

谦逊是最后一种美德，可以被视为整个道德生活的基础。谦逊对于收获其他美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足，它能引导我们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教育家戴维·艾萨克（David Isaacs）这样写道：“谦逊不但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谦逊能督促我们去发挥才能而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赢得他们的掌声。”T.S.艾略特（T.S.Eliot）说：“世界上出现的一半错误得归因于那些想要显得重要的人。”精神病学家路易斯·塔塔利亚（Louis Tartaglia）在他的《十种最常见的性格缺陷以及你所能采取的对策》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精神治疗医生的20多年时间里，他发现最普遍的性格缺陷是“总自以为是是对的”。他说，在治疗过程和生活当中，性格发展的关键简单地说是就要怀有去改变自身的谦逊意愿。

要过有道德的一生显然是困难的。几乎每一个人在实践这十种美德时，至少会在某段时间内与目标存在差距。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些道德上的优点。我相信，它能帮助我们连贯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每一种重要的美德，并集中精力在更加一贯地实践美德时取得进步。正如教育家詹姆斯·克夫林（James Coughlin）所指出的，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明白这些美德是互相关联的；即使只是决定在某种美德上做出认真的努力，也很可能使所有其他的美德都得到提升，就像其中某种美德存在严重的缺陷会导致其他的美德败坏一样。

【作者简介】托马斯·利科纳，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本书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未能在收录前一一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谨表歉意和感谢。请作者与本社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明日教育论坛(总第36辑)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在线》网站(www.eduol.com.cn)

福建教育出版社(www.fep.com.cn)

主
办

明日教育论坛·总第三十六辑

4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一种关注

托马斯·利科纳(美国) 1 你拥有哪几种美德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话题：大学教育的真问题

赵晓力 8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

许纪霖 刘艳萍 14 没有个性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汪振军 20 现代大学理念与人文素质教育

吴祚来 26 精英教育：我们要向国外借鉴什么

彭豪仁 30 质疑高等教育大众化

唐占(美国) 35 中国大学该走自己的路

人与事

蔡 铮 38 我的高中(选章)

摩 罗 52 跟《新语文读本》一起成长

报道与争鸣

丽 芬 58 手记：在特区教书

肖 川 66 教育乱象琐谈

刘 伟 68 应当怎样制定教育发展战略

——从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决策说起

课程研究·解读

顾明远 77 学习学和智慧学

郭元祥 81 学校的30个细节(连载五)

姚于全 87 构建学习型学校的策略

学人论坛

余世存 93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热点

殷海光 邓晓芒 谢有顺 103 遭遇知识分子

域外观察

方 帆 121 小留学生·统考·作弊

翟 华 126 法国孩子啃哲学

后随笔时代

李小猫 129 给远方的朋友写信（第一部分）

余 日 140 天黑后让悲伤结束

——阅读手记之一

品书与观碟

桑永海 144 偏爱“小经典”

侯宇靖 147 《中国》已远

编辑推荐手札

151 中国教育谁买单

152 英国的垃圾

156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粗鲁

160 编后记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名誉主任：顾明远 叶 澜 朱永新 黄汉生

副主任：余文森 康长运 黄 旭

编 委：王 永 田慧生 叶 澜 朱永新 朱永通

李镇西 肖 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郭元祥 顾明远 康长运

黄汉生 黄 旭 焦晓骏 鲁 亢

主 编：黄 旭 张文质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邓诗霞 沈国才 陈玉龙 林 彦 鲁 亢

题 签：顾明远

责任编辑：陈玉龙

特约编辑：鲁 亢

美术编辑：赵 艺

如何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义务教育资源的提供者——政府,能够向公民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资源。这包括四大方面:一是均衡配置教育经费。二是均衡配置办学条件。三是均衡配置教师资源。四是均衡配置学生生源。学者指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法律的“强制”和“督促”,更需要当事人的“自觉”和“主动”。要有共同行动的意识,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不是哪一级政府的责任,是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同时要有共同发展的意识,教育举办者必须办好每一所学校,努力教好每一位学生。再是共同资源的意识,学校的教师和资源既是特定学校的教师和资源,也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政府有权利对这些资源进行再配置。

教学生用网络要多疏少堵

就教育信息化方面“台湾经验”如何为我所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温明正教授认为首要的是观念的转变。由于掌握现有教育资源的人很多不熟悉现有的信息化进程,如何让他们接受这种趋势,如何将现有教育格局升级到“电子版”很重要。台湾的经验是由政府用行政力量引导学校走信息化道路,并以资金扶持打消学校改造的顾虑,在多数学校进入信息化轨道后,其余由市场主导的教育配套自然会及时跟进。另外的软性经验:一是教育信息集约化处理。二是网络化学习,如可利用博客网站设立学习讨论中心,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在网络上互动学习的兴趣。三是利用良好的无线网络资源,让学生利用PDA(掌上电脑)等设备实现“移动学习”,将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在教育信息化的趋势下,老师家长不能一味抵制,教学生善用网络要多疏少堵。

让家长结束恐慌

在作家周国平的一篇“博文”中,他写到:从上小学开始,多数家长就在为孩子将来的逐级考学而恐慌,直到孩子考上大学,恐慌才告一段落。正是在这种恐慌心理的支配下,家长们不断做出非理性的选择,眼下千军万马涌向所谓特长生这座独木桥的荒唐情景只是其中一例。把所谓特长的考试纳入应试教育体制,其结果一方面是使艺术教育、体育的性质发生了扭曲,把它们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应试工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些教育机构在利用现行体制有意地制造恐慌,藉以牟利。事实上,家长的恐慌也助长了弊端的肆虐。为了让家长们结束恐慌,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革除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

▲几十年的教育忽视了自己身后的“一只大象”——传统文化。虽然传统文化中不乏消极的思想,但是传统经典中仍有很多闪耀的精华……

——一些学者认为在教育方式严重趋同的现状下,应当允许“孟母堂”这样的“异类”存在

▲随着南方方言在低龄儿童中的消失,南方学生的古文水平势必继续下降,同时拉低全国语文水平。

——学者李雾著文指出,“对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来说……不是英语会挤走汉语,而是‘母语’——方言缺乏空间”

▲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

——就“中国数学大师为何不多”这一问题,专家认为是因人的“浮躁”,“急于出成果,发表论文”

▲上网的同时,她们并没有放弃阅读图书。我觉得,如果孩子太早接触电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都是有害的。

——俄罗斯总统普金的夫人谈她的“育女真经”,她到女儿14岁时才让她们学电脑

▲加拿大中小学没有期中、期末考试概念,一学年三学期,考试分期分批进行,成绩单上的成绩更是综合平时作业和考试表现给出的综合分,很难看到学生在考前“打突击”的景象。

——加拿大教育界普遍认为,学科知识的学习,是大学里才该做的事

▲那些曾经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走在校园里的女生现在往往穿戴传统的头巾和长袍,以免激怒宗教激进分子。在一些大学的聚会上,音乐和舞蹈被禁止了。

——记者报道伊拉克的巴格达大学的某些现状

▲在批评学生时,教师应当唤醒他的“荣誉感”和“羞耻心”,激发他的“恻隐之心”,建立他的“荣辱观”。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

▲不及格的试卷叫学生重新填一份;硕士研究生没有条件可以做教研,却一年年扩招;发表文章得交钱;有些老师整堂课没来,叫学生白等;学生论文的末尾列出一长串参考文献,其中很多根本与论文无关……

——海外学者评中国大学的浮躁风

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

■赵晓力

欧洲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公元11世纪末。大约从1087年开始，Tuscany的女伯爵Matilda邀请杰出的罗马法教师Imerius到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讲授罗马法，欧洲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这些人如何组织到一起很快成为问题。

由于学生人数的大增，早期师生之间组成的合伙显然不再合适。于是学生们先是按照同乡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但同乡会并不能摆脱各民族的属人法，而学生们来此研习的恰恰是能够成为各民族普通法的罗马法。学校仍然需要一个符合它内容的形式。这个形式终于在罗马法的概念工具中找到了，那就是Universitas，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团。当时波伦亚有两个这样的Universitas，一个由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学生组成，一个由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学生组成。Universitas的存在不以它的成员的存在为条件，大学的成员可以变动，但大学永存；大学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安定的法律形式。

对内，Universitas对成员行使广泛的刑事和民事管辖，组织成员间在生活学习上的互相扶助；对外，它则负责与城市当局、教授以及房东的交涉。这实际上是一个学生的自治体。其总理事会由各同乡会选举的代表组成，总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理事长负责授予学士学位。理事长还任命一个称为“教授告发组”的学生组织，负责告发教授的失职行为。如果教授在教学时间上短斤少两，便可能受到Universitas的罚金处罚。总理事会颁布了大学条例，对大学的经济事务、学生和教授的纪律以及课程的方方面面做出规定。大学条例在颁布后20年内不得改变，除非学生和教授两方面一致同意。

显然，在波伦亚大学的自治中学生占主导地位。教授们组成的教授会有权组织考试和接纳博士候选人，因为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所以这项权力也就是教授会接纳自己的会员的权力。

学生的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学生不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富家子弟就是有修道院的赞助，他们的到来给波伦亚带来了持久的繁荣。

从12到13世纪，学生人数最多时曾达到一万人，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人。波伦亚的房地产和餐饮业端赖学生。教授报酬由上课的学生直接按大学条例付给。如果学生不满意，他们可以轻易带着教授到别的城市去。

但是，这种建立在罗马法法律概念基础上、由学生的经济能力维持的大学自治还是渐渐受到了侵蚀。波伦亚城市当局开始给教授付酬，并要求他们发誓不离开波伦亚。学生们不必向教授交讲课费了，但他们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对大学的控制。

在波伦亚大学创建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虽然传说Imerius曾因反对教皇被革除教籍，但教会并没有试图直接控制波伦亚大学。1219年，当时的教皇发布命令，规定教师的任命，也就是博士学位的获取要经过波伦亚副主教的考试，教会的教学执照成为做大学教师的必备条件。教授会独立决定接纳自己成员的时代一去不返。

日后出现的巴黎大学采取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学生和教师首先组织在神学、法学、医学、文学这四个系中，各系再组成大学。大学由教授，而不是学生管理。从此以后，教授治校似乎成为稳定的大学自治形式。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则最终在19世纪初以后出现的现代研究性大学中稳定下来。

美国的第一所研究性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北大的成立不过晚了23年）。不过和北大不一样的是，霍普金斯大学是由私人——霍普金斯先生的遗赠建立的。在美国，慈善家的捐助使大学一开始就摆脱了地方教会的束缚。而且霍普金斯大学开办时拥有的财政基础就相当于哈佛两个半世纪积累的总和。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立的时候，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又是霍普金斯大学的许多倍。新的研究性大学的出现，最终影响到哈佛、耶鲁那些历史悠久、主要从事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院式大学，由一些州赠地给大学，促使它们也建立研究生院，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

在美国，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以二战为界划为两段。在前一阶段，对学术自由、大学独立的威胁主要来自保守的董事会和唯唯诺诺的校长。比如1901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言论触怒了罗斯福夫人而遭到解职，该校七位教授随即愤而辞职。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次会议上诞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 and

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大学教师类似于联邦法官的“行为良好便终身任职”的终身制（tenure），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学术自由，就好像法官的终身制是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一样。

那时候学术自由还只是被理解为教授个人的一项言论自由权利。而大学校长则要同时捍卫教授的学术自由和大学的学术独立。1936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Robert Hutchins在《美国高教》一书中，对那些指手画脚的校友和自以为是的董事，老实不客气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向学校交了钱就自认应该控制大学，那么就请恕我提醒你，他们所发出的噪音是与他们所支付的钱成反比的。”“学校的董事与校友不同，他们至少无可置疑地拥有控制学校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越明智，就越不会去试图行使这种权利。”

二战以后，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对公私大学资助的不断扩大，政府、以纳税人自居的公众、以公众代表自居的媒体，甚至大学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社区，都对原本属于大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而大学内部，古老的教授治校的传统，似乎在复杂的现代综合大学（multiversity）的管理中越来越力不从心，而让位于学校的行政官僚；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参与大学民主管理的要求，随着学生运动、黑人运动的来临而高涨，但并没有随着运动高潮的过去而过去。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何去何从？

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Sweezy v. New Hampshire, 354 U.S.234 (1957)一案中，借南非的大学校长和学者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表明了他们对学术自由的想法：“大学的四大基本自由是：基于学术理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The four essential freedoms' of a university - to determine for itself on academic grounds who may teach, what may be taught, how it shall be taught, and who may be admitted to study）学术自由不光是教授的个人权利，而应该是大学运作的原则。但是，至少在谁可以入学这个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后来也加入了干预者的行列——比如公立大学在入学问题上优待黑人和少数族裔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大学的历史上，为了学术自由、大学独立而寻找各种庇护者的例子屡见不鲜。

但是，在司法的独立也受到质疑的民主社会中，法律的庇护也并不总是那么可靠。要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最后还得是大学自己。

和中国一样，美国研究性大学的观念也来自19世纪初洪堡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首先体现在1808年威廉三世创办的柏林大学：大学的存在是为了探究真理本身，而不是为了学生个人的职业前途。大学教育不是职业培训，大学教育也不是由教师向学生灌输已有的整理好的知识，而是通过科学进行教育（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师生关系不再是教师先进行探究，然后将探究的结果告诉学生，而是师生一起探究，或者是教师带领下的探究；研究和教学不再是处于两个阶段，而是处于同一个过程；研究性大学，简单说也就是教育、学习与研究的一体化。学术共同体不光存在于作为学者的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也结成学术共同体。裁决争议的最高权威不再是教师的权威，而是真理本身。

在战后的美国，研究性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师生学术共同体，它经受住了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却在1960年代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中面临破裂的危险。1969年，激进的黑人学生在与康奈尔大学的对抗中使用了枪支。黑人学生达不到学校的学术要求或不遵守校纪可不可以被开除？几个星期前，教师会议刚刚否决了黑人学生的要求，但在枪口的威胁下，全体教员又以压倒多数票表决赞成对这些要求让步。当时在康奈尔任教的艾兰·布鲁姆可以忍受学生的激进，但却不能忍受教授的怯懦，他在《闭塞的美国心智》一书中写道：“有少数学生发现嘴上大谈学术自由的高傲的老师，只要受到轻轻的压力，就会变成会跳舞的狗熊。”“这些学生发现，老师们并不真的相信思想自由是好的、有用的，他们认为这一切可能只是用来保护我们‘制度’中的诸多非正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他们对企图改变这个意识形态的暴烈行为的反应就有可能软化。”在布鲁姆看来，教授的怯懦实际上告诉学生：世界上本无真理这回事，所以也就不必捍卫真理。教授的行为等于印证了一些黑人学生的指控：学校以学术或纪律理由开除黑人学生，只不过是学术自由的幌子掩盖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压迫。如果所有号称的真理被证明不过是意识形态，那么那种号召师生一致去追求真理的理念便成为可笑的欺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也许许多教授能够经受来自权力或金钱拥有者对学术自

由的威胁，但如果同样的威胁来自一无所有的学生或群众，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布鲁姆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民主社会中高等教育危机的表现和思想根源。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布鲁姆对美国高等教育失败的估计（布鲁姆《闭塞的美国心智》的副标题是“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了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Henry Rosovsky在1973至1984年间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一职，1991年，他出版了给大学中的三种人——学生、教授和管理者写的手册：《大学：所有者手册》（中译本名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对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发展作了乐观得多的估计。

但是，Rosovsky也同意，大学作为一个师生自愿加入的社团，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用更为民主的方式解决。比如1969年哈佛在黑人运动的高潮中成立美籍非洲人文化中心的时候，在学生的压力和威胁下，教师们投票表决在12个规划委员会成员中，安排6名学生，其中3名必须由非洲和美国黑人大学生协会推选。而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传统上是终身教授的职责，学生参与的结果是学术过程的泛政治化，这种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和11年的大学管理者，Rosovsky告诫，无论如何大学仍然是一个探究知识的场所，在大学的管理中，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这里的知识不是指一般知识。“学生关于要由民主党或共和党在华盛顿执政的意见，与他们的教授们的意见依法同样有效。在设备维修部门工作的雇员，应该比教授更懂得对房屋的维修。大学的校警可能最了解犯罪活动。那么当然，广大校友则体现了最重要的大量知识，既包括一般知识，也包括专业知识。这些学人所缺少的（某些个别校友除外）是关于大学主要使命——教学和研究——的专门知识。学生之所以到学校来，是由于他们缺少知识和希望获得知识，而且在大学教职员中则可以找到有专门知识的人。”“关于教育问题的最后结论，最好留待那些手中握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去做：即留待那些经过长期实践、并已由他们的同行根据充分的证据证明能在教学和科研中完成高质量工作的大学教授去做。”换句话说，教授治校的根据就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学生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带来无休止的争吵和轻率的行动，行政人员治校带来越来越繁琐的程序和表

格，但教授治校则倾向于程序的简洁，以及把行政事务寓于学术活动。教授会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学术共同体的衰落，学术伦理的丧失，必然会使大学由最缺乏学术品格和学术责任的人所主宰。北大物理系的甘子钊老先生曾在一次面向青年教师的讲座上说过，50年代的北大物理系，大家见面就聊某某学报上的某某文章，而到了文革后期，大家在系里碰见就只说，“北新商店又来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白裤衩”。

作为文理学院的院长，Rosovsky的工作面对校内师生，他的《手册》对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着墨不多。这方面的内容可以看Derek Bok的著作。Derek Bok是法学教授，1971至1991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Rosovsky是他任内任命的），1982年，他出版了《象牙塔之外：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译本名为《走出象牙塔》，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讨论大学如何在与政府、公众、捐资者、当地社区等外部社会的交往中保持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大学不是不承担社会责任，但大学却绝对应当以大学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指定的方式来承担这种责任。

从波伦亚大学到今天的大学，大学的形态、组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学的基本精神对真理的探求始终如一。今天中国的大学也面临内外的诸多挑战，不过，这些压力和挑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回应这种挑战和压力的道路是更加接近大学的天命而不是随波逐流，屈服于那些与真理无关的要求。大学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存在，并没有所有者。大学财政上的资助者并不能够以大学的所有者自居；大学事实上的治理者也不能以大学的所有者自居（Rosovsky那本书的名字更准确地应该叫做《大学：用户手册》）。给大学财政资助的人和受托管理大学行政的人，他们的使命是服务于大学，以换取历史可能赋予他们的荣耀，而不是以金钱和权力的理由要大学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要生产有用的知识，企业的研究所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要进行职业培训，只保留工商管理学院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他们要寻求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人，他们完全可以带着他们的金钱和权力离开大学；要知道，实现这样的目标，在任何其他地方，比在大学，都要容易得多。

【作者简介】赵晓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

好大学 没有个性的大学不是

■许纪霖（受访） 刘艳萍（采访）

应试教育不是好的选拔方式，但适合精英流动

刘艳萍：您怎么看今天大学里的人文教育？

许纪霖：我想现在大学的人文教育是非常大的一个欠缺。

.....

以前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是培养博雅人士而不是培养专才的。但是现在大学越来越为培养所谓专才服务，作为一个导向，各种各样的指标实际上就成为专业人才而不是博雅之士的指标。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著名的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一直对大学理念有所探讨。他说大学是教大学生们学习四件事：learn to learn,学会读书；learn to do,学会做事；learn to together,学会怎么共处；learn to be,学会怎么做人。也就是说你不仅学习好、有知识，同时你还应该是有道德有品位有能力的人，还有你要善于和别人相处、有自己的凝聚力。这些才是大学真正要培养的。但是现在大学离这个目标太遥远，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是非常片面的，而其他的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根本没有进入考核范围。

在国外，甚至在中国的香港，他们对大学生录取都是综合的考核。除了要看三年中学的平均成绩之外，还要看是否参加过什么活动，参与过多少义务性的工作以及有没有特长。他们要找出学生独特的地方，要的是有个性的人。而国内相反，大学培养的是标准化的人，以某种科学的管理、标准化的名义来培养所谓的人才。大学用标准化的考核让学生进来，然后再按照标准化的程序一个个把他们生产出来。用李零先生的话说，大学成了养鸡场，大学生的体形都差不多，下出来的鸡蛋也都差不多。我发现原来很有想法很有个性的学生大学四年以后反而变得平庸。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样，明天的社会就是什么样。

刘艳萍：谈到大学的录取标准，您曾经多次评论我国目前实施的这种研究生选拔制度以及其他考试制度，这些评论曾经在網上引起激烈争论，您现

在的观点有所转变吗？

许纪霖：现在的考研制度越来越高考化、应试化，而高考制度更是应试化倾向严重。对这种制度的弊端大家都有共识，而且大家都说要改变这种模式，但是现在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反而在强化。

从专业的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对科技创新来说，对这些有极大妨碍的应试制度为什么还会存在呢？我一直都在困惑这个问题。前辈哲学家曾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存在就肯定说明有合理的成分。一个学者不能仅仅对某个问题只有质疑而没有思考。经过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同时能解决中国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精英流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人人都希望往上流动。同时今天又是个文凭社会，你要有文凭，特别是名牌学校的文凭，你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所以千军万马都挤在这里，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往上流动。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有很好的选拔机制。我国目前也在朝更好的选拔机制的方向努力。

刘艳萍：我国是不是也可能取消高考制度而采取其他选拔方式呢？

许纪霖：这里面有很多前提，一个就是首先不能有腐败。如果教师有腐败、学校有腐败，这个事情就败坏了。在国外这方面是有清律的，它们的大学是有信用的。而现在国内一般的民众不信任大学和大学教授，总觉得这里面肯定会有猫儿腻。这是一重障碍。

第二重障碍就是，如果不通过高考，全部采用面试的成本很高。一个是大学的成本高，因为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面试，作出公正的选择。而对考生来说，他的教育成本也很高。不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有一定的特长，除了教科书读得好之外，还要博雅，比如各种知识面宽广、有某种兴趣技能，比如弹钢琴、下围棋等。这种选择对谁有利？对富家子弟，对城市的小孩子有利。对谁最不利？就是那些在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处于弱势，知道的没有城市的孩子多，家里各方面的资源也很少，更不要说什么钢琴、围棋。考试越简单、越规范，对他们来说就越公平。

所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恰恰又蕴藏非常合理的机制。也就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和农村差距以及贫富差距这么厉害的社会里面，这套制度至少让底层的精英可以往上流动，起到了某种安全阀的作用。如果这道门也关起来了，后面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还是很大的。

办大学不能像办连锁店

刘艳萍：现在很多考生报考都是首选北京上海等城市。您对城市文化很有研究。您认为一所大学和一所城市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城市和大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城市对大学有很大的影响。这几年的考生首选都是北京上海的大学，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大学严重受到了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制约。过去中小城市有一些好大学在慢慢衰落。

一所好的大学也可以影响一所城市的风格，大学对城市有一个文化氛围的无形的熏陶。如果一个城市有所好的大学，这个城市的地位就会上升。比如美国波士顿，由于名校云集，所以它就成为了学术之都，很多精英都是从波士顿出来的。从学术领域来说，地位超过了纽约。也有城市拖了大学的后腿，比如耶鲁大学在纽黑文，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工业城市，这些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开始衰落，因此对这所学校也影响很大。

刘艳萍：您认为应该如何找到突破口来重建大学理想？

许纪霖：现在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管得太多了。所以应该给大学以自主权，然后给大学教师以自主性。我不敢说这是一个突破口，但是这个肯定是根本问题所在。

要容许大学有自己的办学模式，不要用一个标准来考核它。这首先就要少点行政控制，不能用过多指标来对大学进行评估。大学评估一轮一轮地进行，打破了大学正常的日常工作，有的学校还专门成立了迎评估办。这完全是形式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这是技术官僚的过度管理，这就是最大的阻碍。

其次，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授，不应该让行政成为主导。现在大学是被各级管理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着，而落实到大学这一层面，又被学校里的各级行政人员控制着，教授的自主权非常有限，不要说学校，连所在院系的一些基本事务都没有参与权，决定权都在行政手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妨碍。大学教授没有权力，他怎么会有参与感呢？这是一些很核心的问题，现在还看不出丝毫改变，如果这些不改变的话，就会让一些改革措施事倍功半，或者南辕北辙。

刘艳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许纪霖：对。最可怕的是大学越来越千篇一律、千校一面、没有个性，大家